

直播间里的“夕阳红”： 乡村老年人数字接入中的劳动实践与关系重塑

徐 婧 曾维珊

摘要:在当前老龄化与数字化叠加的社会背景下,中国老年人群体如何无障碍地接入数字社会并参与数字实践,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意。旨在破除老年人数字劳动问题的固有预设,摆脱数字劳动“异化”与“剥削”的简化解释路径。回归劳动者主体性与能动性的视角,勾勒出即符合现实,又具有建设意义的老年人数字接入及数字劳动图景。以网络直播间为线上田野,使用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收集经验材料。研究发现,在完成数字接入的老年人中,呈现出“玩转直播间”的多元数字实践,并通过“深层表演”建构出特殊的社会关系想象。透过老年主播的自我叙事,理解老年群体数字劳动的多重意义:他们并非全然被动断连的弱者。我们理应看到数字接入为老年群体带来的社会参与感,创造出证明自我价值的新空间,并为其晚年时光注入了追逐生命意义的动力及价值。

关键词:直播;老年主播;劳动;代际;乡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2-002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XW06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CXW030)

一、问题由来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人口中有13.5%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标志着中国已然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将积极适应老龄化上升至国家战略层次,同时也反映出整体社会在面对老龄化问题时存在一定缺陷。与此同时,城乡老龄人口在公共领域中的可见性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40余年改革开放和城镇化政策的持续作用下,农村地区呈现出青壮年流失、老人儿童留守的空心化问题,且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在上述社会发展的基本底色下,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所面对的问题较之城市老龄人口愈发突出,应引发学界更广泛的关注。

当前社会发展的另一特征则在于数字技术的高度嵌入:周遭世界正朝向深度媒介化的时代转向,数字媒介日益成为构建社会过程的基础设施。因此,老年人的社会生活也无法脱离数字接入而展开。然而,在以往的研究及社会刻板印象中,老年人往往被描述为数字医匮乏一侧的“数字难民”,似乎处于数字时代的边缘境地。实际上,截至2023年12月,50~59岁网民中至少掌握一种初级数字技能的比例为72.8%,60岁及以上网民中至少掌握一种初级数字技能的比例为54.6%,互联网正在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1]在老龄化遇上数字化的社会背景下,应深入理解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现状及其数字接入的各种实践样态,从而为老年群体真正融入数字生活提供助力。本研究聚焦具有广泛数字接入能力的老年群体及其数字化生存的具体维度——数字劳动。我们将当前中国老年人经由各类数字接入后产生的数字劳动置于当下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之中,考察老年主播的数字实践

及其调试策略,并探索上述实践策略的社会建构机制,在承认和尊重其主体性的基础上理解老年群体的数字劳动,特别是以直播为典型案例的数字劳动之多重意义与影响,由此洞见老年群体、媒介技术与数字化劳动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本研究聚焦老年群体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实践关系,其中老年人数字接入过程中的媒介使用和劳动问题是核心议题。在老龄化社会与数字化社会叠加的背景下,探究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现状,帮助老年群体真正地融入数字生活,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福祉,已成为传播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数字接入议题往往涉及老年“数字鸿沟”问题。老年人的“数字鸿沟”研究开始触及数字不平等的后两个层次——使用技能与数字素养。^[2-3]对此学界呈现出两派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老年人实现数字融入漫漫征程依旧任重道远,“采纳沟”的填补可能只是老年人在数字技能上的浅尝辄止;另一种则认为这说明数字技术融入老年人生活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使用沟”和“知识沟”差距也将压缩。^[4]

在接入层面,老年人的触网比率与年轻人有较大差距,偏远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互联网服务设施仍然有待进一步建设完善。^[5-6]在使用层面,由于数字技能缺乏和数字技术缺乏适老化设计的叠加效应,老年人即便接入互联网也无法自如自主地享受各种数字技术功能与服务。在知识层面,老年人的媒介素养薄弱,极易遭受网络谣言和电信诈骗的侵扰。随着学者们的研究继续深入,有国外研究显示,老年人的智能设备使用主要集中于社交媒体和即时通信应用上^[7],新冠疫情发生后,老年人的社交媒体入场率大大提高,互联网也被用于寻找与健康相关的信息。^[8-9]Zhang 团队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为疫情下老年人与他人沟通提供了新的途径,并提供情感支持,降低了孤独的风险,社会支持和社会接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10]周裕琼通过对老年人的微信使用情况的实证研究,改变了老年人无力使用数字技术的刻板印象:超过一半的老人已经采纳微信,并且使用率很高,社交功能为主要使用方向。此后,国内的老年人新媒体使用研究中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以城市老年人的微信使用为主,探索老年群体的信息采纳、使用和传播行为。老年人在微信上的健康信息寻求、采纳行为是主要的关注点。^[11-13]

抖音、快手等低门槛短视频平台带来新的技术赋权,成为当前老年群体进入互联网的重要场域。^[14]有研究指出抖音成为老年群体的新型娱乐方式,在此之中恐惧数字技术和代际间的“数字反哺”现象明显。^[15]然而老年群体短视频平台上的数字接入和使用研究仍处于较为空白的状态。晏青、李宁馨以积极融入社会的媒介使用者视角挖掘短视频创作为农村老人社会融入增添可能性,这一行为表征是边缘群体主体意识觉醒,融入主流社会的有力话语展现。^[16]此外,“数字反哺”和代际关系的研究场域开始向短视频平台转移,徐晓婕认为“反哺”行为产生的直接驱动因素是年长一辈的需要,短视频的学习以及使用过程中家庭的和谐度和亲密感增加,促进更加平等的家庭关系。^[17]基于此,不少学者提出数字融入方案,帮助老年群体摆脱“数字弱势群体”的标签,解决老年人数字融入困境和老年“数字鸿沟”问题。虽然具体举措有所区别,但学者们大体上就建立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支持模式上达成了共识。^[18-20]

伴随疫情发生后空间移动和物理交往受限等原因,作为文化和社会现象的网络直播和短视频,成为互联网空间最典型也最受欢迎的传播形态。已有的研究关注网络主播在数字空间中的数字劳动过程。并将其归结为情感劳动。网络主播进行情感性工作,不断创造并维持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获得流量和打赏。^[21]Woodcock 团队将 Twitch 上的直播者被数字中介的劳动视为情感劳动, Twitch 游戏主播通过建立受众群体获得打赏和广告收入得以营利。^[22]余富强、胡鹏辉指出娱乐主播和受众经过数字中介实现数字空间的在场,主播通过情感劳动获得观众的打赏,自娱型主播自己也在进行情感消费。^[23]涂永前、熊贇发现泛娱乐直播中的女主播以符号化的身体和商品化的情感激发

粉丝的情感制造,构建亲密关系,但过程中劳动者的反抗被掩盖和削弱。^[24]王斌在带货主播研究中认为其收入来源已经从打赏获酬转向带货提成,故而其工作性质也从情感劳动变为数字化表演劳动。表演劳动者大多将表演视作一种趣味,为受众创造一种别致体验。^[25]但大范围直播带货的主播会将这种劳动作为收入来源,将表演视为乐趣则可能忽略它给主播们带来的身心压力。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我们认为现有研究大多认同老年人存在数字融入难题,并在此基础上假设弥合“数字鸿沟”能够帮助老年人共享技术进步福祉。在上述前提下,进一步刻画和阐释了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现状,探究“数字鸿沟”形成的复杂原因、具体表现以及弥合鸿沟的思路与构想等。但上述将老年人判定为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恰恰反映出当前研究对老年人自身感知和自我生命故事视角的忽略。在部分老年人已然完成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接入的前提下,他们与不同媒介平台的关系以及媒介实践与其日常生活的勾连,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阐释。另外,现有研究对农村偏远地区老年人的关注不足,还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经验材料,才能得到更加切合数字中国当前发展现状的基本图景。因此本研究将着力揭示几个问题:一是老年群体进入直播间的动机和数字实践的基本样态;二是上述以直播为案例的乡村老年人数字媒介实践的数字策略;三是上述实践行为中所蕴含的劳动过程,以及这一“劳动”在数字中国语境下的新向度。最后,本研究致力于揭示老年群体的多元性,透过老年人数字实践的多重维度,既看到技术赋权也不轻视技术“负权”,以此呈现老年群体数字实践的丰富面向。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研究着力描绘当前老年人在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实践中的劳动过程及其调试策略,探索并揭示这一过程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建构性要素,以此深入理解老年群体短视频直播数字劳动的多重意义与影响。研究将抖音和快手直播间作为网络田野,在2022年11月14日至2023年12月14日期间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收集相关经验材料。研究者使用相关关键词搜索,在抖音、快手寻找老年人账号和相关短视频,同时以滚雪球和直播间互动等方式链接访谈对象。经过初步观察,笔者以老年主播所处地域、年龄及直播间直播内容作为关键要素,选择了13名直播频次、时长较为稳定的农村老年主播,深入参与观察其直播实践,并展开半结构式访谈。为使研究对象达到差异饱和原则,研究在性别、直播方式、年龄段等方面做出区分,尽量涵盖老年主播的不同类型。因此,本研究经验材料来源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老年主播直播间日常交往互动的观察所得,二是具体访谈所得。第一部分的具体观察对象编码由“性别—网络ID首字母—序号”构成(详见表1)。

表1 观察对象编码

编号	性别	年龄	平台	直播方式	地区	家庭劳动力
M-6-1	男	64	抖音	带货	云南农村	缺失
M-L-2	男	65	抖音	带货转打赏	山东农村	缺失
F-S-3	女	95	抖音	带货	山东农村	有
M-N-4	男	73	抖音	表演打赏	安徽农村	有
M-S-5	男	75	抖音	带货	江苏农村	有
M-7-6	男	77	抖音	带货	陕西农村	缺失
M-Z-7	男	60	抖音	带货	河南农村	缺失
M-6-8	男	60	抖音	带货转打赏	江西农村	有
M-X-9	男	80	快手	表演打赏	陕西城镇	有

续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平台	直播方式	地区	家庭劳动力
M-Y-10	男	未知	快手	打赏	甘肃农村	缺失
F-D-11	女	80	快手	带货	黑龙江农村	有
F-N-12	女	75	快手	带货	河北农村	有
F-X-13	女	64	快手	聊天打赏	甘肃农村	有

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半结构访谈包括以“直播间问答”方式对老年主播进行的线上访谈,从而获取了第二部分的主要材料。通过直播平台私信以及电话、微信等方式,探析老年主播进入直播间的心理动机、经过、感受等,看到直播间背后的数字实践故事。其中,受访者编码由“性别—网络ID首字母—序号”构成(详见表2)。

表2 访谈对象编码

编号	性别	年龄	平台	直播方式	地区	家庭劳动力
M-6-1	男	64	抖音	带货	云南农村	缺失
M-L-2	男	65	抖音	带货转打赏	山东农村	缺失
F-S-3	女	95	抖音	带货	山东农村	有
M-N-4	男	73	抖音	表演打赏	安徽农村	有
M-S-5	男	75	抖音	带货	江苏农村	有
M-7-6	男	77	抖音	带货	陕西农村	缺失
M-Z-7	男	60	抖音	带货	河南农村	缺失
M-6-8	男	60	抖音	带货转打赏	江西农村	有
M-X-9	男	80	快手	表演打赏	陕西城镇	有
F-D-11	女	80	快手	带货	黑龙江农村	有
F-N-12	女	75	快手	带货	河北农村	有
F-X-13	女	64	快手	聊天打赏	甘肃农村	有
M-E-14	男	62	快手	带货聊天	甘肃农村	有
F-L-15	女	65	快手	带货	甘肃农村	有

总体而言,本研究聚焦的老年人直播实践者,年龄主要集中在60~80岁之间;从分布地域来看,以中西部乡村地区老年主播居多;直播目的多以带货、打赏等具有经济利益指向的实践为主。

四、融入与自力:老年人入场直播间的多维动力

(一)重建连接:家庭与社交关系再融入的渴望

数字代沟被划分为接入沟、使用沟和素养沟,对应地数字反哺也分为“器物反哺”“技能反哺”“素养反哺”。^[26]其中“器物反哺”指在智能设备方面的赠予或传递,“技能反哺”指在智能设备功能操作层面的技术支持,“素养反哺”指智能媒介使用观念或理念的输入。老年群体则主要通过自学、家庭反哺与朋辈互助三种方式学会使用智能手机上的软件,包括:进入短视频平台、摸索平台上的各种功能、感受数字世界带给他们的满足和愉悦感。

数字化家庭时代的来临,对城乡家庭亲缘关系的再连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新形式的数字

家庭关系的建构过程中,以即时的音视频形式作为中介的社交媒体发挥着重要的沟通、链接作用。那么家庭中的老年人,必然地被卷入数字化亲缘关系的“再社会化”过程中。可以说,不接入即断连。因此,来自亲缘存续需要的数字反哺成为老年人数字接入的重要动力之一。

老年人所掌握的新媒体知识与其子代、孙代差距显著,面对全新的事物,从“他者”的互联网平台实践中,感知到数字技术对亲缘关系的维系的价值,以及感知到其有用性和娱乐性是老年群体学习新媒体技术的动力。当老年人察觉自我数字接入习得能力较弱时,他们往往会选择求助于亲缘关系成员,于是家庭成为数字反哺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场域。家庭中年轻世代的态度对于老年群体的主动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器物层面,即数字设备的接入层,在观察的13位老人中,只有一位老人的智能设备是自己购入,其余皆为年轻世代赠予,这是老年人数字接入和展开实践的基础。在技能和素养层面,代际间的良性互动尤其是年轻世代的鼓励和数字技能的教授极大带动了老年人接入互联网的积极性,提高了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

“我原来用的是按键,这是娃娃用的旧手机,2018年9月开始我孙女说,你老了没事干,把旧手机给你,快手好,你去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心情也好。然后我开始学习,拍摄作品,我孙女教我直播。”(M-X-9)

如果说代际间基于维系家庭关系的数字反哺是老年人进入直播场域的基础条件的话,同龄人之间的数字连接力,则成为老年人在数字化时代展开同辈交往的必要社会资本。基于环境背景、生活阅历和认知能力的相似,朋辈更容易成为老年群体模仿的对象,他们的数字融入经验对老年人也更具参考价值。老年人在与朋辈群体长期相处中,常常易受对方思想行为的影响,这对于改变他们对数字技术有用性和易用性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那些尚未接入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而言,朋辈群体内部的普及度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老年人为了不在同龄人中落伍而开始学习使用短视频。

当朋辈群体纷纷进入短视频平台,基于害怕孤立的威胁感知,加之受到同龄人成功接入数字世界的鼓舞,老年群体入场的动力倍增。

“我有几位好姐妹,经常一起打牌拉话。前几年都开始拍抖音快手,我还没有智能手机,不会用。见面没话拉。回到家儿子儿媳孙子都玩手机,也没话拉。这就开始学着用手机。后来用快手和老家人居然也联系上了。有意思,但费钱。”(F-X-13)

当家庭中代际的支持与帮助发生滞后、间断甚至缺失时,朋辈群体则可能成为帮助老年人完成数字融入的替代选项。老年人在与朋辈互相交流智能设备使用经验与方法的过程中,由于同龄人面对新生事物时有类似的困惑所以更愿意彼此分享使用心得。家庭中的代际反哺多停留在应对生活所需的功能教授,而智能设备新玩法的激发多是在与朋辈的交往互动中产生的。

F-S-3、M-X-9都表示,曾经在子女的数字反哺无法及时满足自己的数字使用需求时向更年轻的朋辈求助。而如直播一般的新功能、新玩法的习得也使得老年人看到了全新的数字生活景象。通过观察和访谈,我们发现老年人自身主体性的发扬以及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致富理想,是其排除万难拥抱数字生活的根本动力,也是他们开启独立自主地掌握数字技术可能性的钥匙。当老年人缺乏主动掌握数字技术使用能力的动力,无法克服“太难的我就不用,因为我年纪大了”“我老了,学不会这些”等自设门槛和心理障碍时,即使外在社会支持持续发挥作用,他们也极易陷入他人主导的“数字代理”型实践模式。这种代理并非让老年人直接习得数字技能,而是让老年人认为互联网红利可以通过他人代理而获得,从而愈发拒绝自我学习并将网络权力转交他人,甚至形成依赖。

无论是自主学习或是借助数字代理,老年人积极接入数字平台都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对短视频的各种习得是较积极的。根据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并结合访谈,这种自我驱动主要是源于老年人对于短视频直播易用性、有用性和愉悦性的认知。^[27]首先是意识到短视频平台的内容和功能可以自己带来某种需求的满足,并相信其能够带来愉悦;其次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掌握使用方式,这种感知

易用性鼓励使用意图。

M-X-9表示:“我就看到家里头乖孙还有邻居啥子在玩,感觉蛮有意思哩,我看着好像能学得会。加上我乖孙也说愿意教我,我就开始玩哩。”

帮助 M-Z-7 运营的志愿者也提及他强烈的学习欲望和行动力:“没得办法,爷爷家里一个儿子脑瘫,另一个提供经济来源的儿子去世了,他听说直播不费很多体力可以挣钱,说自己必须学会。”

可以看出,若老年群体能够调动自我效能,增强面对新技术时的积极心理,无论是否有来自外界的支持他们都乐于投入并适应社会数字化的过程。

(二)寻找价值:直播致富梦刺激下的数字接入动力

“虽然老了,但不能做个废人。”受访者 M-E-12 曾这样讲到。在访谈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及参与到网络直播行为的动机之一是希望能够在暮年之时,仍旧能为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特别是经济和物质的帮助。代际互助作为中国家庭的重要传统虽然一直在延续中,但自中国现代化转型肇始,不同于传统上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奉养,当下代际互动呈现父母给予子女更多的“恩向下流”的特征,即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双向化:一方面如果子女存在经济压力和家庭平衡问题,因缺乏相应的社会支持,往往将自身的困境转嫁给父母辈的劳动付出^[28],老年人通过劳动来支持子女,使得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子代对亲代的赡养,也呈现出了父母对后辈的“逆向反哺”;另一方面,如果亲代缺乏子代的代际支持,尤其是子女无法给父母提供物质上的赡养时,老年父母则需要自谋生路。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当家庭遭遇变故急需资金时,家庭原有保障体系迅速土崩瓦解,老年人更可能进行生产性劳动以创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乡村老年人因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导致其并未能很好地被纳入社保、养老保险等社会扶助系统。更为严峻的现实则在于,上述老年人在其青壮年时期依旧生活在“靠天吃饭”的传统农村生活的机制下,医保、社保飘摇不定,更难谈及“退休金”等老年经济保障。加之其在社会转型中,家长权威的衰落,乡村老年人的家庭角色、地位的变动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再就业”的冲动。这也成为直播场中诸多老年人进入其中的原始动机之一。

在观察和访谈中发现,持有创收取向的老年主播通常有三种家庭背景:一是自己患病或者配偶患病,家中经济状况窘迫(M-6-1、M-L-2、M-N-4、M-7-6、M-6-8);二是家中由于子代离世或子代患病而丧失年轻劳动力(M-Z-7);三是孙代患病,为子代减轻家庭负担进入直播场(M-S-5、M-E-14)。“人老了,如果还想着当太上皇那就是个没眼色,我孙爱生病花钱的地方多我不能坐在家里等,不赚钱被嫌弃。”(M-E-12)

在多重家庭因素中,“患病”动因尤其引人注目。较之经典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等相关研究^[29],身体健康状况/患病状况从其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阻力^[30],转变为老年主播进入直播场重获经济收入的推动力。这些来自农村务农家庭的老年主播多为男性,随着年龄增长健康状况的恶化致使其体难以支撑他们进行诸如下地劳作、外出务工等传统劳动。在他们看来,直播与传统劳动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且具有门槛低、回报高的优势。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尊老爱老的观念中,他们的高龄反而有助于他们获得粉丝的喜爱与物质付出:“坐家里就能赚钱,虽然不多但比种地好,种地累赚得少。网上人看是个老婆子还是会买点垃圾袋啥的。”(F-L-15)同时,在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下^[31-37],农村地区男性老年主播更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认为作为家中的顶梁柱,自己自然要承担起“在外”拼搏、负责家庭经济的主要责任。但是在当前社会情境下,要找到一个没有年龄歧视、对身体条件要求不高,且让自己能够在工作时照顾患病的家人的工作,并非易事。因此,直播平台的低门槛、便捷性“劳动”——如带货、表演、聊天等行为,及其打赏机制,成为农村老年人重新“在外”拼搏、创收的可能机遇和路径。他们以一种自雇劳动的形式,为陷入困境的家庭谋出路。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重新找到了在家庭中的角色和位置。

M-L-2:“我一心一意地想挣点钱,想快点赚钱,尽快地把腿看好,说实话,我真的开心不起来,我

现在腿不好,走路不行,只能坐着直播,说心里话,等爷爷会走路了,也就好了。……我也不能让我老婆去挣钱,她还照顾孙女。”

而M-E-12提及:“无论赚多赚少,直播是个态度。对子女来说我这个老人还不是老不死的,我还能发挥作用。让他们少嫌弃,自力更生不添乱。”

直播带货的农村老年主播主要有两类收入来源:一是商家的卖货分成,由于老年主播多售卖均价10块以下的日用品,因此其一单的卖货收入平均为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另一个则是礼物收入,收到礼物后,平台扣除50%后剩余部分归老年主播所有。虽然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各类平台中老年人带货直播间流量均有所下滑,也导致了他们收入的减少,但总体水平依旧远高于农村低保和务农收入。直播无疑让身处泥沼中的老年人看到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甚至挽救自我及亲人生命的可能。

家中失去年轻劳动力的M-Z-7开始直播时,带货两个月即收获了13.52万元的纯收入。“虽然现在平台限制流量,(收入)没那么好,但也比原来低保每月600元,种地一年几千块好很多。而且爷爷现在身体也干不了很多重活。”M-6-1也表示:“(直播)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家的状况,因为这笔收入,我儿子孙子孙女的生活都有了保障。”当我们对这种所谓的致富的普遍性提出疑问时,F-L-13认为:“没流量、没人理、没人买,正常。难道就不做了?去外面也是风吹日晒赚不到钱。那不如直播,只要播得久还是有人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乡村老年人入场直播间的动力来源是显著的:一是数字时代家庭与社群融入的社交资本获取的需要;二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阶段必然引发的老年贫困和保障匮乏,则是其寻找替代性社会保障和生活资本的根本动力。而短视频平台的直播机制为他们创造了重新融入数字社会的可能,并在使其重燃致富理想。

五、妥协与博弈:老年群体数字化生存之路

(一)“甘愿”入场:重拾“自我”背后的平台规训与代际压力

促使乡村老年人克服技术鸿沟,“甘愿”入场的根本动因与其“自我价值”“自我实现”紧密关联。根据“价值寄托论”:退出工作/职业场域的老年人仍然向家庭和下一代提供支持,这将是其获得价值感的重要途径。^[33]老年主播在直播间获得经济收入之后,补贴家用、给予子女向下的代际支持甚至是继续作为“顶梁柱”支撑起羸弱的家庭——这一进入直播场的行为,不仅仅是老年群体进入数字场的标志,更是他们重获进入家庭决策中心场的重要路径。在这一“入场”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数字时代自我价值、自我实现的寄托路径。除了上述重获经济地位的认同外,老年人在直播间通过展示其因厚重阅历所积累的丰富生活经验和技能,可能会引发直播间观众对其智慧、经验和才华的认可和敬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过程中,老年群体建立起经由直播中介的新型社会认同,从而建立起对自我生命的价值感、意义感和认同感,这对老年群体在当前社会情境中重建社会关系、重塑社会角色具有重要意义。在上述多重因素促使下,老年人特别是乡村老年群体不仅“甘愿”入场,甚至迫切地需要入场,“在家闲得很,看着村里有人直播带货确实赚到钱了,我也按捺不住,偷偷学着呢。赚点钱有面子我儿媳妇脸色也好看点(笑)。你问我难不难?再难我都愿意学。”(F-L-15)

另有多位主播表示,直播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更重要的是愉悦和消磨时间。生产劳动不再仅是“生存”手段,而与对自我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理解融为一体:兴趣爱好可以成为一技之长,收获赞扬并获得收入,获得自我的确证。“孩子妈生病了,倒在床上,女儿嫁出去了,也不能天天回来家里帮忙。……我直播可以给家里挣点钱,帮我老伴看病,我很满足了。”(M-N-5)“直播间里有人聊天互相关心,我不上播还有粉丝留言问是不是生病了为啥不播……原来我也有社会上的人关心。感觉挺好的,活得还是有点意义的。”(M-E-14)

当新的、更具现代社会意义的“自我”在直播间的数字交往中逐渐浮现之后,进入并不断缔结新

的社交网络关系,即“关联”就成为老年人数字接入的新宗旨。在此基础上,农村老年主播与“异质连接”积极的网络互动生产了缺场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构建了多元社会支持网络。长久以来由于在数字接入方面的迟滞,老年人在数字空间中一直处于“他者”地位——一种被讲述、被形塑的处境。特别是这一群体,在功利主义社会中长期面临的年龄歧视和自我认同困境等问题,成为当下老年人群体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从而成为其社会交往中的最大障碍(如厌老等现象的滋生)。而以直播为代表的数字接入越来越多地进入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后,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中让自己变得可见。在直播间中,他们风趣幽默、服饰搭配得体、积极拥抱新事物的生动样貌,正在改变其落后于时代的刻板印象,也在向社会展示其生命的深度和广度。老年主播们的积极自我呈现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网络社交媒介和“他者”建构的“缺场空间”或被“忽视”的状态。这不仅促进了他们的社交能力和社会参与度,更好地跟上社会变化并融入社会发展,也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趋向于年轻化。年龄认同是指个体对自身年龄和衰老过程的内在体验^[34],积极的年龄认同与提高老年个体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息息相关^[35],通过与年轻人的接触,他们提高了自己的幸福感并减少个体陷入孤独、抑郁的风险。M-X-9就曾提到:“爷爷是消磨时间哩,在直播间造乐,和大家一说一笑,就开心哩,就心态好哩,就不得疾病哩。”

正因在上述直播交往中,老年主播获得了愉悦和满足,使得老年主播全身心投入其中“甘愿”入场,且并不在乎直播具体时长。因此在老年主播这里,劳动和娱乐的界限更加模糊:显然,长时间直播/劳动为平台带来的巨大流量和热度正是平台所乐见且全力号召的。在最初的“好玩”或“记录”等动机之后,部分老年主播尝到了创作/带货甜头,进而迅速投入网络直播的下一个阶段——变现——“兴趣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哈特和奈格里较为系统地阐发了“非物质劳动”的定义,即“产生和操纵轻松、幸福、满足、兴奋或热情等情感的劳动”^[38]。这之中,流动着的更多是情动(affect)的生产和控制。情动的特征使得老年主播以自己的兴趣和自我实现为引擎,在劳动过程中通过弹幕的赞美、观看人数、点赞量以及获得的收入不断获得认同感和满足感,并构建线上的朋友圈。^[39]从兴趣和玩乐出发,老年主播们自我情感需求的满足成为他们持续劳动的动力,但是除了以消遣为目的娱乐之外,他们还需要维系与“顾客”的互动和关系。当原本是聊天解闷对象的观众转变成潜在的“顾客”,因此老年主播需要展露出一定的服务性,才可以顺利留住观众,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顾客”,从而顺利变现。而伴随着其直播目的商业化程度的加深,原本的“甘愿”劳动,逐渐被平台创收法则约束,形成劳动规训,也产生心理压力。

对于那些明确持有获利目的而入场直播间的农村老年主播而言,粉丝数、点赞量、观看人数皆变为财富的隐喻和流量的量化指标——在数字时代的劳动一般以流量获取为准则,“在商品生产中附着于货币的‘量的规定性’在平台经济中被转化为‘流量的规定性’”。^[40]这种“流量的规定性”实际上是卢卡奇所说的商品与货币形式的“物”成为逾越于一切关系的圭臬在数字平台上的表现。流量成为衡量一切的准则,是人气的表征,更标志了收益。主播的行为、情感表达等一切实践活动成为流量中的数字而存在,个体劳动被可计算的“量的规定性”所宰制。直播时段的选择和直播时间的长短影响直播间的流量,并且延长直播时间在流量不足的情况下被视为是一种弥偿。平台、主播、用户之间长期处于一种漂浮不定的非正式关系之中,从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型的不稳定的无产者。他们面临收入不确定、劳动保障缺失等各类劳动关系风险。而为“薪”直播的农村老年人因缺乏安全感和竞争优势,往往选择延伸直播时长的方式来缓解焦虑,在晚上进行长达8小时甚至12小时的直播,从而成为更加典型的不稳定无产者。

M-L-2:“没有办法,以前直播看的人还多一点,现在有时候就几个人,为了多挣一点,那我只能晚一点下播。”

由此可见,当下数字平台“流量为王”的内在运行逻辑使得乡村老年人在以直播为新的劳动渠道时,将比其他群体更容易陷入“非自觉”的不稳定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然而他们在察觉了已超出其

劳动力界限的“超长直播”可能造成的不适时,却会因家族代际的资源责任,咬牙坚持:

“有时候会觉得比较累。我直播主要是陪聊天,什么人都会遇上。也会遇到上来就骂人的,素质很低,但我还是坚持。时间长一些会吸引更多的人进来,人多最后结算的钱多点。家里小孙子上学要钱。”(F-X-13)

“家族为主,个人为从”^[41]的家庭主义价值观依旧让父母用无限责任伦理来要求自己,承担的是一种对子女和家庭无条件的责任和义务。有研究指出,老年人帮助成年子女及其家庭的无私付出是传统文化积淀的家庭和睦的表现,是一种家庭中的利他主义。^[42]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家人之间以血缘为纽带团结凝聚,肩负无条件地彼此照顾扶持的责任和义务^[43],他们也已然意识到中国现代化转型给个人带来的重压,这种外部的压力迫使亲子两代甚至三代人萌发出新的代际合作形态。在传统的家庭主义的观念影响下和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下,这些老年主播的动机不是从子女身上获取预期的回报,而是关心整个家庭的福利。看似自我牺牲型的数字劳动,背后是老年主播在传统家庭主义观念和转型期中国社会背景下子代压力激增影响下主动的选择,并且他们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为家庭发挥自我作用的效能满足,而不是被剥削感。

(二)有限的博弈:作为老年主播软性抗争武器的“弱者”定位

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权利和公正时,采用一些微小的、难以被察觉的非暴力的抵抗策略来进行反抗。^[44]另有研究者通过对青少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中发起的“微行动”^[45]、外卖骑手对平台控制的软性抗争手段^[46]等实践案例的阐释来延伸韦弗的理论。“弱者的武器”的理论视角对于我们理解老年主播在数字平台上的诉求、呼告与意义生产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老年主播的数字劳动缺乏正式的工作保障和权利保护,面临着诸如收入低、工作时长过长、直播过程中的身心压力尚无保障等问题。在广袤的平台之中,老年主播的声量微弱且隐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平台和算法的逻辑规训中毫无博弈能力且沦为被剥夺者。虽然其诉求往往因声量、可动员社会资本、自身博弈能力等多重因素所限,难以撼动建制化的平台规则并得到满足,但其通过无意识地使用“弱者的武器”,借此与平台的规训抗衡并彰显其自我赋权意识。

一般情况下,老年主播的反抗以一种与平台周旋的“非叛乱的方式”进行。由于生理机能的退化以及数字接入的滞后下对于数字技术底层逻辑的陌生,老年主播记忆和理解能力常常难以适应平台复杂、快速更新的规则。账号莫名其妙的异常状态是他们最焦急却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那些违禁词我不会查,不会搞,很容易被说是违规。我一开始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违规?还是因为被别人举报了?我着急得很,但是又不会搞。后来我女儿帮我一起想办法。”(M-7-6)

面临低收益、被限制流量、对规则感到茫然费解等问题时,老年主播们会采用发布视频抱怨、“卖惨”,并“破罐子破摔”的心态无视平台规制、缩短直播时长等软性的碎片化抵抗手段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抵抗。M-6-1曾发布视频,表达自己对于平台限流的不解和不满,以及自己的茫然无措:“我就种地我不说话,抖音官方违规不?”

面对平台的限流,直播间里的观看人数从3位数掉至个位数,M-6-8选择“卖惨”来应对,希望通过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从而给平台施加压力。“本来以前蛮好的,也能卖出去点货,莫名其妙就不行了,没人看了,东西卖不出去,我不会讲解。……也只能这样了,看我可怜下单,或者打赏,这样也可以了,总比没有好。希望大家一起帮我想办法让平台不要再限我流了。”

由于老年主播互联网使用的独特性和社会结构特征,公开且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对于他们来说过于困难,也过于危险(被平台封号)。因此,在家庭年轻一辈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网络也在反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老年主播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构建自己的“联络点”:第一,在抖音/快手“开小号”以应对平台“关小黑屋”、限流等制裁;第二,转移阵地,通过其他社交平台 and 口碑宣传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扩大传播和影响力;第三,建立自己的粉丝群体,将公域流量池中的流量引

为自己的私域流量。不同平台的“社群”构成了星罗棋布的“联络点”,由于个体同时活跃在不同平台,因而这些“联络点”相互勾连,搭建成复杂交错的网状结构,并形成了较大的能量。这些非正式网络一方面帮助他们在主账号陷入平台制裁时,得以使用“小号”继续直播,获取收益;另一方面,让他们在面对平台剥削时,得以进行反剥削实践——平台劳动者可以通过培养自己的流量池,绕过平台,增强自己在劳动关系中的控制权。^[47]私域流量的获取帮助老年主播们减少对平台的依赖而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渠道和黏性较强的粉丝社群,从而获得更多的主动权。但是这种赋权往往并非老年主播自身的主体性发挥便可以达成,需要家庭中年轻世代的数字反哺以及粉丝群体的自发组织。

M-S-5 在开始直播之初的大半年内,直播间的观看人数一直停留在两位数,有热心粉丝将其经历和故事编写成文字发布于其他社交平台,号召公众前往直播间观看。与此同时,M-S-5 也在女儿的辅助下持续地学习直播技巧和平台规则,并和家人不断优化选品和商品展示,现今他的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已达到一万人以上。

即便是有被迫入场直播之嫌的老年主播,他们也在直播实践中进行着无声的抗议,如:表情麻木、目光呆滞地盯着镜头,独坐昏暗角落,“不会讲解,请自助下单”的机械话术等。他们虽然没有实施明确抗争话语和行为,但以无声抗议和“摆烂式”工作作为抗争的武器,宣告其“被逼迫”“被剥削”表象下涌动的主体性。

“弱者的武器”看似在建制化的平台社会中显得微不足道,但在大量的边缘/弱势群体使用这些策略后,会对控制方及其建构的压制性的体制带来一定的影响并产生改变的压力,从而达成一定的自我保护和权利平衡的目的。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以直播为案例的数字接入和数字实践过程,当老年人特别是乡村老年人入场之时,上述被誉为“夕阳红”^①的老年群体为何跨越“鸿沟”入场直播间?他们克服硬件、使用技能的匮乏,克服乡序良俗可能带来的冷眼风语进入直播,践行互联网交往的内外动力究竟为何?他们在直播间的数字实践所引动的平台劳动应该怎样去理解?

如果说本研究的受访老年主播因其家庭亲缘、代际的交往、连接为首要数字接入动力而进行跨越鸿沟的媒介使用技能学习,其家庭成员对硬件设施的资助是进入这一过程的基础条件。因亲缘联系、同辈交往等多重人际情感连接需求的表层之下,本研究中更多数的乡村老年主播则是源于继续参与家庭物质资源的再生产的渴望,而坚持“做主播”的。因此,自身家庭的经济状况是老年人在直播间内的媒介实践类型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而进入直播间进行数字劳动被部分乡村老年主播视为农业生产活动的替代性选项。然而我们还应看到,虽然乡村老年人做主播的动机是显性的,且在直播间的带货、打赏中,老年主播收获了社会认同、感知到自我的社会价值,从微观层面他们所收获的平台流量转换为现金收益后,使其在家庭、家族、乡里中找回了昔日的尊严,这对乡村老年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认同与“满足”。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在直播场景中老年主播仍然被平台规则紧紧束缚,他们也在数字空间中通过“拉群”、开小号等手段展开“弱者申诉”,以此与平台进行博弈。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接入数字生活的老年人普遍认同新媒体的内容和功能会给自己带来某种需求的满足和愉悦,并相信其能够享受到数字红利,从而促发产生接触新媒体的自主意愿。此外,认为自己有能力掌握使用方式的这种感知易用性增大他们的使用意图。老年人对于新媒体科学的认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克服和消除对数字技术“学不会”“学无用”的心理障碍,主动拥抱数字生活。另外,因社会历史原因,中国农民基础养老金普遍较低^[41],养老体系不健全,加之家庭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稍有“不测风云”,农村老年人便需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进入直播场,带货、打赏成为其

^①注:1993年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夕阳红》栏目,成为唯一一档老年人节目。而“夕阳红”一词也成为描述老年人的代表性修辞之一,其中蕴含了对老年人生活美好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想象和期许。

重获保障的信息网。

本研究旨在揭示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的基本逻辑:老年人并非数字社会的“遗民”,在家庭、同辈、社会的多重压力和动力的推动下,他们选择主动入场,并从中获得价值感、意义感。而在直播间中,他们进一步习得数字社会的劳动、工作的范式,进而入场数字资本生产的过程。可以说,老年主播已成为平台社会数字劳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群体之一。本研究并不仅仅聚焦其数字劳动的深层机制,并对平台资本对其劳动控制的一般性批判,而是还原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数字化进程和老龄化现实之间的某种张力——老年人并非固化的社群,其在数字社会的接入过程中有其显著的主体性、能动性。然而这一主体能动性不仅受到经济条件、代际支持的影响,同时也受同辈人交往、地域社会环境以及平台规则的制约。因此,当我们谈及数字时代老年人究竟是被“赋权”或是“负权”,仍需从其真实的社会处境以及中国的宏观社会语境出发,并还原这一复杂的人的境遇。

最后,因本文所涉及的观察、访谈对象多来自中西部乡村地区,其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乡村老年人的生活境遇应有较大差异,也为本文的后续聚焦提供了新的维度,即将老年人数字接入话题中的区域地理差异展现出来,以更加全面地呈现当代中国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及其基本面貌。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22-02-25. [2024-03-22] <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4/0325/MAIN1711355296414FIQ9XKZV63.pdf>.
- [2] 熊慧, 尤佳. “居间代理”与“技术赋能”:智慧养老模式下老年居民数字融入路径评估与重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11: 49-53.
- [3] 陆杰华, 韦晓丹. 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理念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数字鸿沟与知沟理论视角. 人口研究, 2021, 3: 17-30.
- [4] 周裕琼. 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7: 66-86+127-128.
- [5]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调查的相关数据. 2012-12-26. [2022-06-22]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2/02/26/the-new-normal-in-the-digital-age/>.
-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2015-07-22. [2023-07-22] https://www.cnnic.cn/NMediaFile/old_attach/P020150723549500667087.pdf.
- [7] B. Wetzel, R. Pryss, H. Baumeister, et al. “How Come You Don't Call Me?” Smartphone Communication App Usage As An Indicator Of Loneliness And Social Well-Being Across The Adult Lifespa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8(12): 6212.
- [8] 吴信训, 丁卓菁. 新媒体优化老年群体生活方式的前景探索——以上海城市老龄群体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调查为例. 新闻记者, 2011, 3: 65-69.
- [9] A. T. Chen, S. Ge, S. Cho, et al. Reactions To Covid-19,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Use, and Social Connectedness Among Older Adults with Pre-Frailty and Frailty. Geriatric Nursing, 2021, 42(1): 188-195.
- [10] K. Zhang, K. Kim, N. Silverstein, et al.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Loneliness among Older Adult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Contact. The Gerontologist, 2021, 61(6): 888-896.
- [11] 陈娟, 甘凌博. 向信息寻求关系——基于微信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研究. 新闻记者, 2021, 9: 10-24.
- [12] 王蔚. 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研究. 国际新闻界, 2020, 3: 91-107.
- [13] 李彪. 数字反哺与群体压力:老年群体微信朋友圈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国际新闻界, 2020, 3: 32-48.
- [14] 彭兰. 短视频: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 新闻界, 2019, 1: 34-43.
- [15] 刘向阳. “银发群体”的“数字化生存”——老年群体新媒体接触研究. 新闻爱好者, 2021, 7: 76-78.
- [16] 晏青, 李宁馨. 联结、驯化与社会应许:农村老人短视频使用与社会融入研究.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2, 6: 26-36.
- [17] 郑超月, 徐晓婕. 数字反哺机制研究——以95后及其父母的短视频使用为例.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3: 12-17.
- [18] 贺建平, 黄肖肖. 城市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与实现幸福感:基于代际支持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 国际新闻界, 2020, 3: 49-73.
- [19] 王婉, 刘汝建, 牛澍. 后疫情时期老年数字鸿沟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珠海市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调查.

- 新媒体研究,2022,12:1-7+51.
- [20] 潘曙雅,邱月玲.“银色数字鸿沟”的形成及弥合——基于2001—2019年的文献梳理和理论透视.新闻春秋,2021,1:27-33.
- [21] A. R. Hochschild.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 85(3): 551-575.
- [22] J. Woodcock, M. R. Johnson. The Affective Labor and Performance of Live Streaming on Twitch. *tv.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09, 20(8): 813-823.
- [23] 余富强,胡鹏辉.拟真、身体与情感:消费社会中的网络直播探析.中国青年研究,2018,7:5-12+32.
- [24] 涂永前,熊赅.情感制造:泛娱乐直播中女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青年研究,2019,4:1-12+94.
- [25] 王斌.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中国青年研究,2020,5:61-68.
- [26] 周裕琼,林枫.数字代沟的概念化与操作化:基于全国家庭祖孙三代问卷调查的初次尝试.国际新闻界,2018,9:6-28.
- [27] D. Liu, A. Liu, W. Tu. The Acceptance Behavior of New Media Entertainment among Older Adults: Living Arrangement as a Mediato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20, 91(3): 274-298.
- [28] 王跃生.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整、矫正和维系——以制度为视角.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4:14-25+157.
- [29] 殷旺来.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研究热点、趋势及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2,2:113-120.
- [30] 张文娟.中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人口与经济,2010,1:85-89+92.
- [31] 贾云竹,马冬玲.性别观念变迁的多视角考量: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5,3:29-36.
- [32] 许琪.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来源和异质性——以“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6,3:33-43.
- [33] 张新梅.家庭养老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假设推导.人口学刊,1999,1:58-61.
- [34] G. Kaufman, G. H. Elder. Grandparenting and age identity.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03, 17(3): 269-282.
- [35] C. L. M. Kayes, G. J. Westernof. Chronological and Subjective Age Differences in Flourishing Mental Health and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Aging & Mental Health*, 2012, 16(1): 67-74.
- [36] 于鹏亮,付圣.青年亚文化视域下网络流行语的使用行为与社会心态分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11-115.
- [37]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6-97.
- [38] M. Hardt. ‘Affective Labor’. *boundary 2*, 1996, 26(2): 89-100.
- [39] 刘芳儒.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理论来源及国外研究进展.新闻界,2019,12:72-84.
- [40] 曹晋,张艾晨.网络流量与平台资本积累——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考察.新闻大学,2022,1:72-85+123.
- [41] 张爱华,岳少华.个体化抑或家庭主义:河北上村代际关系的实证调查.学海,2018,6:141-146.
- [42] 孙鹃娟,张航空.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2013,4:70-77.
- [43] 刘汶蓉.当代家庭代际支持观念与群体差异——兼论反馈模式的文化基础变迁.当代青年研究,2013,3:5-12.
- [44] 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
- [45] 蔡金平,董金权.弱者的武器、利益共谋与意义空间的生产——青少年“微行动”的基本形式与发生机制.中国青年研究,2017,4:59-64.
- [46] 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2019,6:50-57.
- [47] 燕道成,蒋青桃,陈蓉.数字劳动视域下的移动游戏陪练:剥削、异化与反抗.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5:60-73+127.

Chasing the Sunset in Livestream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Rural Senior Citizens

Xu J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Zeng Weisha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text characterized by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overlay of digitalization, how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accesses the digital society and engages in digital practices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This paper aims to challenge the inherent assumptions surrounding the digital labor and labor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break away from the simplistic path dependency of "alien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digital labor, and return to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of the laborers. It seeks to depict a realistic and constructive picture of the elderly's digital access and digital labor. Using live streaming rooms as the online field, the study employs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collect empirical material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mong the elderly who have achieved digital access, there is a diverse range of digital practices demonstrated in "mastering the live streaming room," and they construct a unique social relational imagination through "deep performance." Another group of elderly hosts relies on "digital intermediaries" to access the digital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being projected into the live streaming space like marionettes. Through the self-narratives of these two types of elderly hosts, we can understand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elderly group's digital labor in short video production. They are not entirely passive or disconnected individuals, nor are they objects of "exploitation" and "alienation."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sens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that digital access brings to the elderly group, the new space for proving self-worth, and the dynamism and value it injects into their later years in the pursuit of life's meaning.

Key words: live streaming; elderly anchor; labor; inter-generational; rural

■ 收稿日期: 2023-11-11

■ 作者单位: 徐 婧,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陕西西安 710049

曾维珊,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 责任编辑: 刘金波